

評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邱毓斌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By Ming-sho Ho.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xvi+269 pages.

2014 年一年之內在台灣與香港發生了兩個大規模群眾佔領運動：春天在台灣的 318 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運動（太陽花運動），以及秋天在香港要求真普選的佔領運動（雨傘運動）。面對這兩場時間相近、青年學生角色極為顯著、形式同為長時間佔領、起因都與中國有關的社會抗爭，任何研究民主轉型與社會運動的學者都很難克制去比較這兩場運動的慾望；一方面，「比較」從來就是當代社會學者認識社會與發展知識體系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這兩場運動具有被何明修教授稱為「翻轉歷史的抗爭」（eventful protest）的性質，不只展現出與一般民主社會中日常化社會運動之不同風貌，也為兩地各自的政治發展帶來關鍵影響力，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作為一個無法將這個慾望付諸實踐的人，我很高興看到何明修教授能夠出版這本比較兩場運動的專書。這本書展現了驚人的研究能量：面對這兩場規模如此之大的運動，何教授能夠在短短不到三年時

間，多次前往香港，完成了 138 位受訪者（香港 72 位、台灣 66 位）的訪談，蒐集非常廣泛的資料，然後再歷經出版的審查、修訂等學術勞動過程，在 2019 年年初正式出版；接著，何教授立刻以英文版為基底進行改寫增刪，於同年年底出版了《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sup>1</sup> 這整個從研究到出版的過程，真的是一件令人非常佩服的學術成就。

## 本書的三個貢獻

何教授這本書並不是單純的紀實回顧，我認為這本書最起碼在三個層次上為我們帶來可貴的知識討論：第一、簡要但是很精準地回顧了兩地過去 30 年的社會抗議以及民主化歷程。對於兩地政治發展不清楚的讀者，這些知識可以協助讀者迅速理解香港從 1970 年代的社會運動發展，及 1980 年代以來所歷經特殊的「去殖民化但是沒有獨立」（decolonial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回歸歷程中的社會動能的變化；同時何教授也回顧了台灣從 1970 年代以來政治轉型與社會抗爭風潮的發展，特別是勾勒出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之後青年抗爭運動的脈絡。這讓我們得以充分理解這兩場運動興起的背景。

本書的第二個重要知識貢獻，在於透過這兩場運動的比較提出了一種分析社會運動的綜合理論架構。何教授指出，社會運動理論的主流研究，從古典的「政治機會及其限制、組織、構框、劇碼」的研究策略發展至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研究典範，認為研究者應該放棄追求普遍性的因果規律，而將重點放在找尋「機制」，並將民族主義、民主化、族群衝突等政治社會學因素拉進來分析。另一陣營則是較為強調社運能動性的建構派，認為運動者的特質以及主觀

---

1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於 2019 年 12 月由讀書共和國出版。全書主體對於太陽花與雨傘運動之比較，何明修進行了若干精簡刪節，但是增寫了一章〈香港的時代革命〉來討論 2019 年 6 月以來因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抗爭風潮。本文評論係以英文版專書為主，對於中文版的參照主要在於若干理論概念的翻譯部分。

的理解與詮釋對於運動之發展有顯著的意義，忽略這些層次的討論容易滑落決定論的陷阱裡。面對這樣古典的社會學爭論：到底是客觀環境有利於運動之發生？還是運動行動者的能動努力，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本書綜理了兩方面的理論典範，指出社會運動的多面向過程，並且挪用兩邊陣營的理論視角予以加工修正，比如說從前者引進動員網絡、世代、機會與威脅來說明兩場運動的起源，另外也從建構學派的脈絡，探討運動者傳記因素如何影響了領導決策、抗爭中的創意、以及運動所帶來的情緒效果等等。在這些分析面向之上，何教授提出了「對峙僵局」（standoff）與「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兩組概念，來作為比較這兩場大規模運動的理論框架，成功地帶領讀者認識兩場佔領運動的領導決策有效性、運動發展策略以及最後的運動成果差異。

本書第三個貢獻，在於為中國崛起如何對周邊國家社會產生影響提供了一個研究理解的路徑。中國在進入千禧年之後所加強的「交流」、「讓利」策略，並無法完全讓香港社會臣服，於是加進了「愛國教育」、「加速經濟整合」、「介入選舉」等策略試圖鞏固其在香港統治的正當性，但是這樣干預隨即引起系列的反彈；另一方面，中國對台政策除了若干「讓利」措施之外，則以多方管道培養強化在台代理人，以期在台灣內部營造出支持與中國進一步整合的力量，但是這樣的作法同樣引起了來自社會的反抗。換言之，中國自 1980 年代以來的一國兩制策略，既無法有效安置香港成為一個乖順的特區，也無法引誘台灣社會接受與中國的統一。於是我們看到在進入 2010 年代之後北京對於香港的統治策略逐漸放棄「兩制」精神，而逐步收窄香港的自由以及基本法裡應允的民主進程。本書說明了中國因素在兩地社會所引起的反應，包括了民眾（特別是青年）對於中國的認同變化、公民社會（包含社會運動團體以及政治反對派）的反應與抵抗。這樣的研究路徑不只適用於香港與台灣，即便是在沒有發生大規模反對運動的國家，如何準確地理解其社會對於中國因素之反應與變遷，何教授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啟發。

當然，對於這兩場運動的比較是本書核心。面對規模如此龐大的佔領運動，任誰都很難宣稱可以掌握全貌。何教授提出了六個知識迷團（puzzle），作為比較兩個大規模運動的視角：（1）為何台灣與香港這兩個保守社會中會出現大規模的激進抗爭？（2）為何看起來成功機會渺茫，但抗爭仍會出現？（3）為什麼學生在這兩場運動中扮演了領導的地位？（4）為什麼運動資源比較多、準備比較充分的香港，其雨傘運動卻以失敗收場？（5）為何兩場運動都能夠出現自動自發的運動貢獻？（6）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促成了民進黨的全面執政，香港雨傘運動卻造成政治反對派的分裂，如何解釋兩場運動的政治後果差異？如前節所述，何教授引用了幾個社會運動的理論概念建立全書結構：包括運動興起之政經背景（China's impact）、社會運動領導樣態（movement networks）、運動的爆發與延續（opportunity, threat, and standoff）、運動劇碼之特性（improvisation）以及運動後果等等，來解釋他所提出的這六個知識迷團。

## 兩個補充與討論

以下篇幅，我僅從兩地社會運動史，以及隨機應變（improvisation）策略等兩個面向，進行兩地社會反抗運動歷史的補充，同時也與何教授的研究展開一些對話。

### 一、兩地社會運動的歷史

何教授扼要回顧了台灣與香港兩地的政治發展歷程，以及自 1970 年代以來的社會抗爭歷史，並且提問了「為何大規模抗爭會出現在兩個保守的社會？」。但是，如果把時間尺度再拉長來看，香港實在難以說是斥拒大規模抗爭的保守社會。綜觀整個二十世紀，香港社會持續出現大規模的社會集體抗爭，例如 1920 年代有名的三大罷工：1920 年華人機工總罷工、1922 年香港海員總罷工、1926 年延續 16 個月的省港大罷工；戰後 1947 年的左翼電車總罷工、1956 年

的雙十暴動、1966 年因天星小輪加價所引起的九龍暴動、1967 年起於聲援膠花廠工人罷工，後由文革中共所擴大策動的 67 暴動、1972 年的全港教師總罷工（並隨成立了香港最大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1989 年為了聲援天安門民主運動，全港數次百萬人大遊行；回歸之後，則有 2003 年反 23 條立法 50 萬人大遊行，另外紀念六四晚會與七一回歸紀念日遊行動輒出現十幾萬名的參與者。即便大規模社會抗爭的主題不一，形容香港是一個具有抗爭歷史記憶的城市並不為過，這跟台灣的集體抗爭歷史是非常不同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當「追求更好的生活」的狀態受到威脅時，就可能出現傾巢而出的社會動員。於是，當多數家庭都有不同代的成員曾經參與過不同的集體社會抗爭事件，上街示威對香港社會而言，並不完全是一件生活世界之外的事情。

相對來看，台灣社會對於群眾運動的參與則相對陌生。如果扣除 228 事件在各地引發的衝突，台灣從 193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期，群眾抗爭行動在台灣社會生活中幾乎銷聲匿跡了半世紀。而從 1980 年代政治轉型以來的群眾運動，人數規模也從未如香港那麼多（一直要到太陽花運動期間的 330 集會才出現 50 萬人的集會）。因此，要論社會的保守性格，台灣恐怕更甚於香港，也因此台灣為何能在 2010 年代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抗爭，並且接受太陽花運動的激烈行動，恐怕更需要進一步的解釋。

## 二、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作為一種運動型態

何教授提出了「臨機應變」的策略反應來分析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兩場大規模運動能動性的特質。的確，如此大規模同時長期的社會抗爭，不可能所有的劇碼都是由領導階層的決策所規劃與發動。特別是拜網際網路與 3C 產品的發展，讓個人層次對於運動的支持或參與，變得更為可能。我要特別補充，在台灣社運脈絡裡，最早的「臨機應變」反應可見於「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這場起於 2004 年的並持續迄今的運動，可能是因為無關中國因素，並未被何教授直

接聯繫至太陽花運動的發生。不過，樂生保存運動在 2005 至 2007 年的高峰期，就曾經出現過類似「臨機應變」的運動策略，匯集了一波廣泛的動能，抵擋過第一波強拆的危機。

一場社會運動要能夠出現隨機應變的行動，領導核心不僅需要獲得認同，也必須要能夠對於各種運動劇碼採取開放的態度。樂生保存運動的主體是院民組成的「樂生保留自救會」與由青年學生組成的「青年樂生聯盟」（多稱「樂青」）。以該兩組織為核心，邀請許多的社群（如學生、人權 NGO、律師、學者、社大、社造團體、藝文工作者、宗教團體等）造訪樂生院，同時對於不同社群團體發動的支持運動採取了開放的態度，於是在高峰期我們看到部落客串連行動、網民集資登廣告（那時候還沒有群募平台！）、各種影展紀錄片展、學者連署集資登廣告、樂生兒童夏令營、樂生社區地圖等等。這些行動都不需要得到運動領導核心的同意，而是由不同群體成員自願發起，層層相疊呼應，從而在 2007 年 4 月號召了一場約 5,000 人的遊行，並成功逼使行政院出來協調，暫緩了台北縣政府的拆除行動。<sup>2</sup>

再者，樂生保存運動的經驗，不僅號召出原本不同領域的社運者以及社會各角落的素人投入運動，也建立了千禧年以來不同社會運動團體交互支援作戰的型態；即便「樂生保存運動」的主體「樂青世代」並未明顯地在系譜上延續參與下幾波的青年運動，但是其所創造出來的跨域參與合作模式影響了後來的農村陣線、野草莓運動、反國光石化運動、311 福島核災後的反核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甚至是太陽花佔領運動。而不少樂生世代的學生在幾年後都轉為成為社運團體工作者，他們之間的網絡、他們與當年各社運團體、學術界形成的網絡，在太陽花運動發生的當下就立刻熟練地聚集起來，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鞏固了太陽化運動以議場為核心的佔領行動。

最後，我贊同何明修教授指出「臨機應變」不是萬能的，這種

---

2 更多細節可見於邱毓斌（2007）。



策略仍然有其侷限。特別是當領導中心太過脆弱或者出現歧異，由其他個體發動的「臨機應變」不見得能產生積極的效應，甚至可能會對運動產生負面的影響。於是，我們在香港金鐘自發張貼文宣除了壯麗的連儂牆之外，也出現了滿街「拆大台／防散水」、「通緝左膠」的攻擊性文宣；或者，台灣在佔領發生後的第六天，少數派學生於3月23日午夜佔領行政院的行動，都可能對運動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用幸運來形容太陽花或者有點不妥，但是台灣324的即興行動導致了當時政府血腥鎮壓的決策，因而再次拉高了整個佔領運動的動能；而香港傘運本來就多頭馬車的領導階層在遭受群眾挑戰之後，從而顯著地削弱了後續動能的發展能力。

## 結語：新的社會運動模式？

何明修教授對於香港傘運與台灣太陽花的比較，為我們點出了一個社會運動典範轉移的問題意識。有效的領導階層，並留存各界即興動員參與空間，是可以動員出原本預存組織網絡所動員不到的行動者。也就是說，一場standoff／事件式的運動的壯大，領導層必須要能夠提供一定的空間讓外部者參與才有可能。作為社會運動研究者，何教授的著作引起我們接續要思考的問題是：過去以組織疆界清楚、動員層次明確的社會運動型態，是否已經走到盡頭？最起碼，社會運動組織都應該要開始反省，過去的組織動員模式是否太過排他（exclusive）？如何在資訊社會的技術上，過去疆界明顯僵化的社運組織能否變更為包容（inclusive），同時也更加民主？拿傳統上組織領域最為僵化的工會運動來說，這樣的問題已經困擾各國工會領導階層甚久，也不乏出現各種更為創新、更為包容的行動策略試驗；香港與台灣的這兩場運動，或許都能提供一些解答的線索。

2014年的這兩場佔領運動，表面上產生了不同的運動成果，並且引發了迥異的後續政治發展。但是從2020年的現在來看，我們看到兩場運動的後勁仍在產生作用。我同意何教授所言，這兩場運動

所帶來的衝擊，將於未來數十年間繼續影響著兩個社會、東亞區域關係，甚至是更廣的全球地緣政治。

## 參考文獻

Ho, Ming-sho. 2019.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何明修，2019，《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台北：讀書共和國／左岸文化。

邱毓斌，2007，〈另一種轉型正義：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思想》6: 1-18。